

智慧谋略（一）

魏龙科　主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审时度势.....1
胸怀全局.....15
预见未来.....28
明察秋毫.....49
防患未然.....62
随机应变.....76
猎奇创新.....100
刚柔相济.....126

审时度势

所谓审时度势，就是审察时机，忖度形势。审时度势，是军事谋略家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而采取及时恰当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它既包括对形势的客观分析与正确判断，又包括恰当地把握时机，驾驭机遇，作出正确处置的能力。一个成熟的军事谋略家，不仅要有审时辨机的智慧，而且要有把握时机、驾驭机遇、作出决断的魄力和应变力。因此，重视审时度势是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善于审时度势，是古往今来高明军事谋略家的共同特征。规模巨大、斗争复杂的中国历代军事斗争中，对战争指导的审时度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在审时度势方面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为丰富军事谋略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兵家论机势

《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兵机理论。作者认为，凡兵有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全在一人。所谓地机，就是指那些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也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谓地机。所谓事机，也就是善于行使间谋，指挥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对方君臣不和，相互埋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所谓力机，是指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是谓力机。只有知道这四机，并深谙其道者，才可成为将军。

四机俱备，是战争取胜的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的战斗中，四机不可能都俱备，因此，就有必要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因形用权，创造战机，从而克敌制胜。所以，一个好的将帅，不仅要知道四机，其关键还在于在战争中如何具体地运用并创造战机，从而有效地打击敌人。

古代名著《淮南子》中也论述过兵有三势二权，须在战斗中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发挥。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气如飘风，声如雷霆，威振敌军，此即气势。路道险，大山名塞，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一人守隘，千人难过，此即地势。敌方疲劳倦怠，内部纪律混乱，粮草又缺，士有怨声，便可乘势攻取，此即因势。二权即知权和事权。善于运用间谍，并且审错规虑，善于掩蔽自己，出其不意，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就是知权。当敌人正在行军时，进退都惧怕，长长的队伍，前后很难联系，左右也不相联系，我方可用兵击之，收到事半功倍的战斗效果，这就是事权。势与权，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可孤立地看。要战胜敌人，除了掌握三势二权的道理外，还应该拥有精良有素的吏卒，选拔良才，使将得其人，而在定计决谋时，又能明于生死，达到举错得失，莫不震惊。果能如此，不用云梯冲刺也可拔下敌城，不用兵刃相接，便可破获敌人。

《淮南子》的这些思想，与《吴子》相比，基本差不多，而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强调战略进攻，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善于寻找、利用并创造战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尽可能地以谋取胜，以智取胜。以较少的兵力，获得较多的战果，甚至达到不直接交兵便可战胜敌人的理想效果。所以，当好一个将帅，关键并不在于

他拥有多少将士，而在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将士以及如何调动这些将士。使他们发挥最佳的战斗力。

待机而发

所谓待机者，即乘敌人内乱而取之，费力少而成功者大。姜太公认为，时难得而易失，待机而动，事乃有功。所以古代用兵，必须待时而动，因机而发，时机未到，不可妄动；时机已到，不可迟疑。历代帝王能成其大业者，均善于取乱，乘机而伐之，现以清朝灭明的历史作一说明。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众人起义，打得明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很快攻进了北京城，明朝崇祯皇帝缢死梅山。李自成自以为明朝灭亡，天下太平了，便在北京称帝，忽视了北部势力满清帝国。此时，满清看到中原大乱，人心惶惶，明朝已被推翻，而李闯王又刚刚称帝，政权不稳，想乘机侵犯中原。但是，要找到一种讨伐的借口。

当时，大学士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李闯王在明朝京城称帝，明朝臣民莫不切齿痛恨。如果我国乘此机会出师，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布告中国臣民，必望风归附，共同攻击李自成。这样，驱除流寇，平定中原的愿望，便可一下实现了。

可见，满清想借中原力量以平定中原，以明朝旧臣民来反对李自成政权，以此推翻李自成，取而代之。这是第一步。为达到这一步，便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为恢复明室作战，从而拉拢明朝的臣民为我所用。当此目的达到后，便可将矛头指向明朝臣民，使其听从满清指挥，向满清称臣，以达到平定中原、统一中国之目的。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李自成夺取了政权，但天下战争仍在进行，残余的明朝将士，还在各地活动，同时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别的武装也在蠢蠢欲动，反对并影响李自成政权的开拓局面。同时，李自成已推翻明朝政权但人心尚未归附。因此满清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受到明朝旧臣一部分人的欢迎，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再者，满清兵力也不算弱，而李自成的部队却是连年征战，十分疲惫，同时又处在胜利陶醉之中，战斗力下降。这是满清入关的实力基础。

正是从诸多方面考虑，满清决定进兵关内。当多尔衮将此想法禀呈太后时，太后很是同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方案。接着，多尔衮便采取措施，去掉了自己的政敌豪格，使内部安定团结，接着便率师进犯，借助明将吴三桂的力量，很快攻入山海关。李自成虽有抵抗，但最终还是败于多尔衮。时间不长，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节节败退，终于失败。北京一破，天下大震，满清乘势大举入侵，四面出击，扫荡明室，采取各种办法，分化瓦解打击起义军，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以汉人治汉人，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这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告灭亡。

逆取顺守

对尚未腐败或过去有恩于我的政敌，在其有可取之机，我们能否兴兵动众，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常常摆在战略家的面前。就道德的观点而论，这当然取之不义。但就政治和军事的观点而论，却是理所当然。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攻取天下，往往取决于时机。当有可取之机，就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要取之，决不能坐失良机，留下后患。当然，攻取之后，对那些被征服者，不宜过多杀害，而应该妥善安排。甚至给以一定的官位俸

禄。这便是军事斗争中的逆取顺守的原则。善于运用此术，即可成就事业。据《三国志》记载，魏文帝英勇善战，但在战略上往往有失算。而不善于逆取顺守，便是其中一个方面。

孙权派兵杀害关羽之后，激怒了刘备，刘备便兴兵攻吴，吴国形势危急，孙权便派使者来魏求降，求救于魏国。魏文帝接待使者之后，便问刘晔该如何处理此事，刘晔回答说“孙权不会无故来求降的，现在他遣使求降，其中肯定有急情。不久前孙权用计袭杀关羽，占取了荆州四郡，刘备很生气，想来刘备必然兴师伐吴。这样，吴国外有强寇，人心浮动，怕我中国乘机讨伐，所以前来委地求降。孙权善于用兵，反应又快，知权达变，其用心必在于此。当今天下三分，中国则占有十分之八，吴蜀两国各得一州，阻山依水，唇齿相依，有急相救，这本是两国共同利益。可现在它们还相互攻击，这是天意要其灭亡。依我之见，我们应该乘机伐吴，蜀攻其外，我攻其内，吴国不旬月便可灭亡。吴国一亡，蜀就孤立，彼以一州之众与中国抗衡，其胜败不十而知。为今之计，应兴兵伐吴，灭亡吴国，然后再集中力量伐蜀。最后统一天下！”魏文帝没有采纳刘晔的战略意见，他说：“吴国向我称臣求降，我若兴师攻伐，天下归附者，必起而疑惧，兴兵攻吴不足可取。”文帝终于接受吴国求降，拜孙权为吴王，失去了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使吴国力量得到了暂时的保存。

乘势攻取

古人云：“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应该有孤军深入的胆略，不能迟疑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善于乘势者，

必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勇往直前，无所疑惧。犹豫两可，瞻前顾后，往往会坐失破竹之势，给敌人以喘息休整之机，一旦敌人并力固守，就难攻破了。

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在讨伐敌人时，往往率兵乘胜追击，不断巩固并扩大战果。李世民与薛仁杲大战，薛仁杲招架不住，便率残兵奔逃。李世民则指挥将士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路高歌。窦轨觉得这样穷追敌寇，士兵疲劳，要求休息一段时间，他对李世民说："我们这样一路追杀，很辛苦疲劳，万一中敌引诱之计，怎么办？况且，我们已经取得胜利。应该就此打住，停止追杀，打扫战场。"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你讲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经考虑很久。对我们来说，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全面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敌人来说，大势已去，剩下的也只是残兵败将，没有多强的战斗力。所以，战斗的主动权和决胜权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应该乘着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将敌人一网打尽。要是停下来放走敌人，便是坐失良机，后果对我们是不利的。"于是，继续前进，追杀逃兵，直至捣毁敌人的老巢。

又如李世民大战列武周大将宋金刚时，宋金刚大败，逃跑如鼠窜。当时，诸将都劝李世民不要穷追不舍，孤军深入，怕有伏兵危险。不如"留壁于此，俟其粮毕集，然后复进。"李世民不听，日夜加紧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激战数十回合，结果大破刘武周。刘武周彻底崩溃，便与宋金刚逃往突厥，请求避难，但突厥却腰斩宋金刚。刘武周所属州县均皆失守，统归于唐。

再如李世民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屡次败北。李世民便进而围攻王世充。当时，洛阳防御甚严，固若金汤，

王世充也准备与李世民决一死战，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将领提出退兵，待集中更多兵力，然后攻城。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大举而来，气吞山河，当然乘胜攻取，一劳永逸。目前，东方诸州均已望风款服，唐兵取胜，已是天理。唯有洛阳城负隅顽抗指日可下，洛阳城防御虽严，只是一座孤城四周无援，势不能久。而我们功在垂成，唾手可得，为何弃城而走？岂不是丢失良机吗？”于是下令进军，决不手软，先攻克武牢，进与建德大战，斩杀甚众最后生俘建德。王世充毫无抵抗力量，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身家性命，便不战而降，向唐称臣。至此，李世民已基本上控制全国局势。

可见，李世民在隋末二百多支起义军中，独树一帜，逐步征服异已，从而实现重新的统一，建立唐朝，这并非侥幸取胜，而是他勇于攻取，善于乘机，竭尽人事之所为。他有勇有谋，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用兵得当，大唐江山很快建立起来的。

谋取内江

一国之内乱，往往由于内政不修，国弱民贫，人民离怨。但亦由于敌人离间，君臣猜忌，与敌人以可乘之隙。纵观历史，善于取乱者，大部份都会使用间谍，打进敌人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使其相互残杀，从而坐收渔利。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军，在军事镇压同时，还在起义军内部制造混乱，谋取内江，在政治上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千方百计地制造起义军内部分裂，达到镇压起义的目的。

爆发于 1841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大半个中国，大有破竹之势。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直接打击了满清封建统治，同时也

损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于是，镇压太平天国，便成为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内外反动派，单对太平天国采用军事镇压同时，必须从政治上来瓦解太平天国。所以，帝国主义向满清政府献计："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它们的胜利，有之，唯内江而已。"这条计策，深得清政府的赞赏。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叫嚣，主张以知贼为急务。也就是说要急于了解和掌握太平军的内部情况，然后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打击太平军。于是，他们派遣训练有素的间谍，打入太平军，刺探情报，安插奸细，窥探太平军中有无"吞并之事"，企图制造分裂。

比如，潜伏于天京城内部的清朝官吏张继庚，即为内奸。他曾七次写信给反动头子向荣，向他报告不少有关太平军的军事设施、兵力配备、人员调动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使得清军能及时了解太平军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为使太平军"相互涂炭"，他利用机会散布流言，说"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其目的在于挑拨太平军水营与东王府官兵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团结，并极力煽动湖南官兵自行"结盟"，拉山头，搞宗派，甚至策划他们投降于清军，从太平军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清军还将太平军将领"分别等次新旧"，分门别类，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付措施，妄图从中寻找缺口。比如，对太平军内部的异己分子，他们的原则是"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坐收渔人之利；对加入太平军的少数所谓"读书明理之人"，他们的原则是收买，使其充当内奸，"谋内讧"，"通消息"，搞策反；对少数投敌叛变分子，他们的原则是利用他们去拉关系，

给太平军内部写诱降信，采取挑拨离间、封官许愿等手段，引诱、腐蚀起义军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培植效忠清王朝的分裂投降势力。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清军使用谋取内讧的战略战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效果。除他们自身的势力外，还在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动荡，出现了混乱，客观上为清军的潜入提供了契机，使得清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石达开的率部出走，韦昌辉的屠杀事件，竟使得太平军大伤元气，人心涣散。在这危急之时，清朝咸丰帝一再叫嚣“乘其内乱，次第削平”，“乘其人心涣散之际，设法散其党羽”。再加上，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放松了警惕，也没有乘势出击，而是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不思上进，贪图享受，以致太平军内部的危机日益加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军重整力量，四面反攻，围困天京。在江西战场上，曾国藩部队顺江而下，剿灭太平军，进逼天京，直接威胁着天朝政权。清军还用重兵尾随石达开，前堵后追，逼得石达开走投无路，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石达开出走太平军总部，标新立异，但结果却无一生还。这其中，就有着清军谋取内讧的重要因素。再如天地会虽然参加太平军，但仍保留自己的称号与旗帜，内部纪律松驰，军械不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畛域之见，心胸狭窄，经常与太平军发生矛盾。在天京被困的极端困难之时，矛盾更加突出，甚至相互猜疑，相互攻杀，给清军以可乘之机，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最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局限性，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由于其内部的混乱与分裂，终以失败而停止了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因其内部分裂而告彻底失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是兵家必须恪守的一种战术，而且，是否善于审时度势，是衡量一个将领素质的重要标准。如果敌国还没混乱，而要攻取它，则必劳而无功，敌国局势已经混乱而不乘机攻取；便是坐失良机。古时有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审时而动，乘机攻伐。所以，未乱之时，应该安抚民心，养精蓄锐，以待其弊，敌国已乱之时，应该果断举兵攻伐，切勿误机资敌。古人云："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三国时代，姜维屡次征讨魏国，劳民伤财，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其关键就在于他不能审时度势。周文王政宽养民，富国强民，于是能以少取多，越王勾践抚恤民众，最后也是以弱胜强，其关键在于他们能正确地审时度势。

唐朝时，颉利发兵进攻突利，突利派使者来唐求救。皇上便向众大臣征求意见："我与突利是兄弟相称，关系不错，现在他眼前有急，我不能不救。但是我们和颉利之间却有盟约在先，互不侵犯。这该如何是好呢？"众大臣相互窃窃私语。兵部尚书杜如晦说："皇上，戎狄无信，终当负约，我们不能拿盟约来约束自己。如果当今我们不乘其乱而攻取，今后我们就会后悔无及。而乘乱取胜，乃是古之道也。"接着，张公谨也认为可以攻取，并且具体陈述攻伐的理由。第一，颉利纵欲肆凶，横行霸道，专横独断，谋害善良，昵近小人，是一位昏君，由此，君臣关系不顺。第二，颉利属下的同罗、仆骨、回纥、廷陀等部自立君长，不服颉利，意欲反叛，内部混乱。第三，颉利被别人怀疑，他现在出兵征讨，众兵败无疑，过去欲谷丧师，无抚足之地，兵败将折，没有

多强的战斗力。第四，北方正值霜旱，天气寒冷，而粮草却又匮乏，不能久战。第五，颉利疏远突厥，反而亲近诸胡，而胡人本性翻覆，变化无常，大军临近时，其内部必然发生叛乱。第六，华人在北方很多，他们结屯而聚，保据山隘，都有归附之心，王师出击之日，必然望风响应，可以里应外合，打败颉利。种种情况足以说明，颉利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是乘乱攻取的好时机。”

皇上觉得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决定派兵进攻颉利，援救突利，出兵不久，唐兵攻破定襄，大败颉利，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实践再一次说明，乘机攻乱，必定胜利。

清代代理四川盐茶使赵藩敬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撰写了一幅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对联可以说是对诸葛亮入川后平定西南和治理益州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幅对联中汲取许多教益。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历史经验的问题上，对联的下联所概括的诸葛亮决定治蜀方针的故事，对后人启示颇深。

《三国演义》在第六十五回中写道，刘备夺取成都后，重赏文武有功之臣，一一加封定爵，然后“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使蜀中“军民大悦”。接着，刘备为了实现西川的长治久安，又委托诸葛亮拟定“治国条例”。而在如何治蜀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法正产生了分歧。孔明坚持以法治蜀，在拟定的治国条例中“刑法颇重”。对此，法正谏道：“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但诸葛亮并没有因法正劝谏而“宽刑省法”，他对法正说：“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诸葛亮这段话，将汉高祖治国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西川的现实状况分析得头头是道，法正听后心服口服。诸葛亮坚持以严济宽、以猛纠弘治理西川，果然，“自此军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使惨遭战争破坏的西川，在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演义中孔明和法正对治蜀方针的两种见解，和历史记载完全一致。它启示我们，无论是制定军事方针和策略，还是制定治国安邦的政治方针和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即使是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果不“审势”而照搬照套，也是必定要碰壁的。法正之所以“知其一，未知其二”，就在于他只看到了历史经验的一面，而没有研究现实的客观实际这一面，结果提出了一个削足适履的主张。诸葛亮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看问题，可以说正是坚持了两点论，坚持了从实际出发。

历史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借鉴，按照过去的成功之路去走。但是，有许多法正式的人物，重经验而轻现实，他们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环境的改变、条件的变化，历史的经验也会“贬值”，老路子往往走不通。

古人讲，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否则，只在具体方法上作文章，决不会有大作为。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治理军队、指挥打仗更是如此。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若失去了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就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之中；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军人，如果不注重研究客观现实，不重视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丰富的历史知识就会成为僵化他思想的牢笼。

中国革命的审时度势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十分重视审时度势。认为在复杂的军事对抗活动中，清晰透彻的形势分析和环境洞察，是制定谋略决策的依据，是确定奇谋方略的基石，审时度势的准确程度直接关系到谋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因此，始终坚持把审时度势作为谋略运筹的思维起点。

毛泽东认为，审时度势中的“时”和“势”属于客观实际，“审”和“度”属于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认识，审时度势的过程实质上是对战争形势的认识过程。在军事上要做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关键是要正确审时度势，“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他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51 页）

正确的谋略决策需要科学地审时度势，但是，应审哪些‘时’、度哪些‘势’呢？历代军事谋略家审、度‘时’、“势”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国内敌对两军之间；审、度“时”、“势”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突破了历代军事谋略家思维的局限性，给审时度势赋予了全新的含义。首先，他把审、度“时”、“势”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世界，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世界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其次，他把审、度“时”、“势”的立足点放在无产阶级的主场上，放在革命的立场上，固而能时刻把握“时”、“势”的本质与主流。再次，他把审、度“时”、“势”的内容确定为从战略上研究时代、国情时局、格局、时势、时机，从战役战术上研究“敌势、我势、地势”，并强调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四大基本因素的分析，对上述内容作出正确判断，这就使审时度势有了可操作性，便于战争指导者掌握。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始终把审时度势作为谋略决策的前提。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审时度势始终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实践的重要内容。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政治形势、军事形势、时局的论述，不仅体现在许多长篇论著中，而且包括在大多数文章之中。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初，毛泽东通过科学的审时度势，揭示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根据“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客观实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通过对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形势的正确分析，及时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的“七大”，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

通过对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的科学预见，为我党我军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不断作出正确判断，为全党全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宏谋大略，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胸怀全局

“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这句话，也说明了谋略的系统思想。所谓系统全局，就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谋略，就是说在谋略时从整体、全局着眼，强调总体效果，不拘泥于局部利益与效果，更不能丢掉全局，只顾局部，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最优的效果。

系统严谨

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士弥牟修筑周城，由于他对整个工程的长度、高度、宽度，沟渠的深度，用土的数量，运输的远近，竣工的日期，需用的人工及所要消费的粮食数量等等，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因而在 30 天内如期完成了巨大的施工任务。苏轼治理杭州西湖，也是采取了系统谋略的思想。据冯梦龙《智囊补》记载：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荒芜的湖面），将安所置之？湖南北 30 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